

刘希庆 著



顺天而行

——先秦秦汉人与自然关系专题研究

齐鲁古社

刘希庆 著

顺天而行

—— 先秦秦汉人与自然关系专题研究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顺天而行：先秦秦汉人与自然关系专题研究 /

刘希庆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9. 9

ISBN 978 - 7 - 5333 - 2270 - 0

I . 顺… II . 刘… III . ①天人关系—研究—中国—先秦时代②天人关系—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IV . B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8501 号

顺天而行

——先秦秦汉人与自然关系专题研究

刘希庆 著

出 版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 qlss. com. cn
电子信箱 qlss@ sdpress. com. 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270 - 0
定 价 35.00 元

序

刘希庆同志的专著《顺天而行——先秦秦汉人与自然关系专题研究》，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作为他读博士时的指导老师，我读完以后，非常高兴，一是感到他的博士论文成果即将出版面世，发挥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二是感佩他在学位论文受到答辩委员会的好评之后，并未满足，就此止步，而是虚心吸收大家的宝贵意见，精益求精，再接再厉，继续修改和补充，终于写出这样一部更加完善和丰厚的著作。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所谓“天人之际”，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不断被思考和探讨的永恒课题，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留下了丰硕的成果，蕴含着人类智慧的结晶，闪烁着光彩夺目的思想火花，值得我们深入发掘，汲取精华，发扬光大。因此，本书的选题极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古代，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又存在着极度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科学和虚妄（或者说迷信）往往纠缠在一起，因此在研究中需要把两者仔细剥离，或者说需要通过虚妄的外表透视科学的内核，这无疑给问题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只有坚持跨学科探讨，多角度审视，多层次剖析，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取得科学的成果。作者充分认识到这一课题的特点和难点，不畏艰巨，勇于探索，终于有了可喜的收获。

通观全书，成功之处主要有四方面：首先，摸清前人研究的

情况和主要成果，以此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作前沿研究；其次，以扎实的材料工作为基础，对有关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和梳理，选材得当，运用准确；第三，从实践和观念、社会和自然互相关联的角度切入，结合思想史、科技史进行研究、论述，宏观考察和微观分析兼顾，古代学术话语与现代科学论断互相照应，方法对路，有所创新；第四，具体研究成果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有现实意义，对加强环境意识、环保观念有启迪作用。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跨学科课题，本书作者能取得如此的成绩，与其本身的学术背景有关。刘希庆同志大学本科修的是气象专业，毕业以后曾从事过气象工作，取得实践经验，同时又始终保持着对中国古代的人文、社会科学浓厚的兴趣，因此后来考上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他的硕士导师是苏州大学中文系曹林娣教授，曹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后来坚持从事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的教学和研究。在曹教授的指导下，刘希庆同志不仅丰富了中国古文献的学养，而且深刻认识到精通古文献和古文献学是研究一切古代学科的根底，因此硕士毕业后又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们共同商量，充分考虑到作者的学识结构特点，才定下来本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进行类似的古文献整理和研究，必须具备文理两方面的学养和古文献学的根底。早在两千年以前，西汉成帝时，刘向主持校理朝廷藏书，在分工上就体现了这样的规律。当时书籍分六类，即六艺（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天文、历法、五行、占卜、科技等）、方技（医药、神仙术等），刘向本人负责六艺、诸子、诗赋三方面书籍的校理，涉及范围涵盖了今天的文史哲学科，相当于所谓“大文科”；而其他三方面特殊书籍的校

理则只能推举各有特长的专门家担任，如请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本书的研究课题，所涉文献，如果按汉代的学术分类，与六艺、诸子、数术、方技几类均有关，只有当今兼通文理并且具有古文献根底的复合型人才方能胜任，刘希庆同志此书的撰写成功，就是一个切实的例证。当然，这一极有意义的课题，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开拓发掘的余地都很大，因此深盼本书作者凭借自己的优势，再接再厉，勤于耕耘，继续有新的论著问世。

3

孙钦善

2009年4月于北京大学

序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上篇 思想观念和实践态度	
第一章 万物有灵	13
第一节 万物有灵观念	13
第二节 祭祀及其反映的实践态度	18
第二章 道家自然观	30
第一节 道家自然观	30
第二节 从“无为”到“纯任自然”	35
第三章 天人相分	45
第一节 天人相分观念	45
第二节 制天命而用之	48
第四章 天人合一	54
第一节 《易传》之天人合一	55

第二节 董仲舒之天人合一	61
第五章 思想观念与实践态度的复杂性	74
第一节 人类对自然的实践现实	74
第二节 思想观念和实践态度的复杂性	88

中篇 顺天而行

第六章 顺时	99
第一节 生产实践中的“时”	99
第二节 社会生活中的“时”	147
第三节 顺时分析	175
第七章 地宜	214
第一节 生产实践中的地宜	214
第二节 地宜分析	244
第八章 向位	256
第一节 社会生活中的向位观念	256
第二节 向位观念分析	273

下篇 遵天而尚

第九章 灾害	293
第一节 灾害成因分析	293

第二节 救灾实践及其反映的人与自然关系	312
第十章 灾异	319
第一节 灾异分析	319
第二节 灾异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372
第三节 “灾异说”的目的和意义	382
参考文献	387



绪 论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类关注的热点。当前，理论界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也有不少成果问世。^① 尽管如此，学人对于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关系，尤其是先秦秦汉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却缺少综合、全面、深刻的思考。本论题的研究即针对此问题展开，期望能够对先秦秦汉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做出相对深入的探讨。

为了探讨先秦秦汉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进行阐述。人是自然中的一分子，具有动物性的特征，是一个自然物。同时，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物。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体。“自然”也存在着多重

^①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到 90 年代中期延续不断。论者把影响较大的相关论文和专著列举如下：于光远：《自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 年第 10 期。叶平：《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和取向》，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 年第 1 期；《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 年第 5 期。余谋昌：《“人与自然”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 年第 11 期。吕乃基：《人工自然的进化及其代价》，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 年第 5 期。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编：《马克思恩格斯论“人与自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 年第 4、5、6 期。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人与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黄鼎成、王毅、康晓光等著：《人与自然关系导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年版等。

的含义，一般认为，“自然”可以区分为第一义的自然和第二义的自然。第一义的自然也可称做“天然的自然”，“它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和宇宙观的角度，从它与其他物质存在相区别的角度，从社会关系不属于这个概念的角度，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有各的对象和自然科学各部门对象总和的角度来考察的关于自然的概念”^①。第一义的自然只有被人类认识以后才有意义，在这之前，它早于人类而存在；第二义的自然也称为“人工自然”，它是从人类社会在实践中与自己发生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的自然，也就是人在实践中与之发生关系的自然环境，它是对人类实践发生影响的一切自然条件的总和。显然，第一义的自然是第二义的自然的基础，正因为有了人的出现，才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而我们今天所谓的“人与自然关系”，一般是指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的群体同第二义自然间的关系，即人类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②在此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关系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既有客观实践，也有思想观念，还有社会文化等。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显然，要在一部论著中全面论述是不可能的，只能讨论人与自然关系中某些方面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于中国古代环境史的研究开始浮出水面。进入二十一世纪，历史学领域谈论环境史研究成为一种时尚。^③“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思考与“环境史”研究

① 于光远：《自然》，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 年第 10 期。

② 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一般所指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但是不可否认，人与自然关系还存在另一个内容，即思想的人和生理人的关系。宋明理学所关注的“天理”与“人欲”是这种关系的表现。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并非本书所涉及的，或许以后，论者会做深入的思考。

③ 王利华先生有关于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综述，见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前言》，三联书店 2007 年版。另外，此书所收台湾学者刘翠溶先生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也涉及了中国学者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环境史的情况。

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认为：“环境史较精确的定义为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相会的界面。”^① 这里的“其他的自然系统”指气候、地形、岩石、土壤、水、植被、动物和微生物。这样看来，“其他的自然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环境。这样，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就是历史时期内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再如，美国学者J·唐纳德·休斯认为：“什么是环境史？它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② 休斯先生强调了环境史是人类同自然相互影响的历史。这样看来，历史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就是环境史研究考察的核心。

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同环境史研究的相关性，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古代的人与自然关系有着很好的启发。众多学人认为，环境史的研究必须是交叉研究。刘翠溶先生认为伊懋可先生指出了跨学科研究对于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为了解人类与自然环境间之互动，历史学者必须尝试学习自然科学并掌握超出传统历史训练的相关知识。历史学者需要有系统地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便致力于研究环境史。换言之，环境史必须采取跨领域的研究途径。”^③ 休斯先生认为环境史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他的《什么是环境史》中探讨了环境史

^① 转引自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② [美] 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 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版。

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系^①；李根蟠先生也认为：“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以研究人与自然互动的环境史不能不借鉴多种学科的方法和成果，实行跨学科的研究。以前，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基本上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范围内进行，它的口号是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成为基本的治史方法，这也是前所未有的。”^②

由此看来，环境史的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它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各个学科。作为环境史研究核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也应该采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我们认为，科技史、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交叉融合的视角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意义的视角。比如科技史和思想史的交叉融合。人们通过对自然的认识，一方面适应自然，另一方面又发明各种技艺和工具来最大限度地影响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首先是自然科学的历史。同时，人类在对自然环境的实践过程中，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态度。^③ 所以，选择思想史和科技史的视角，并注意两者的融合研究，是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角度。本研究将主要集中于思想和科学的视角，也涉及社会生活史和政治史等视角。

^① 请参看 [美] 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2页。

^② 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③ 休斯认为：“至少在某一方面环境史可以被视为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如果这种探询仍是历史学而不是哲学，它就不应当偏离这样的问题，即人类的态度和观念如何影响着它们对待自然现象的行为。不管怎样，确定个人和社会一方有什么重要的观念也是环境史事业中十分确凿的一部分。”见 [美] 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环境史研究中注重的观念和实践态度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我们来看关于先秦秦汉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情况。其一，思想史的研究状况。自民国时期至今，出现了大量的思想史和哲学史专著，其主要代表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等，还有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周桂钿的《秦汉思想史》、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以及葛兆光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等等。这些著作涉及了先秦秦汉时期的

况做了详细的梳理、分析、论证。书中涉及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观念，如“殷代的宗教思想”、“老子的自然哲学”、“庄子的自然哲学”、“孟子的天道观”、“荀子唯物主义的自然天道观”、“董仲舒的神学世界观及其天人关系论”、“王充的唯物主义知识论以及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逻辑学”等等。由于作者是从整个社会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所以只是涉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多集中在观念的分析论述上。

其二，科技史的研究状况。关于先秦秦汉时期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也从科技史的角度出发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著作涉及了各个自然科学学科，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代表性的著作。另外，国内前后出版了大量的关于科技史的专著，涉及天文学、气象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医药学、冶金铸造、机械力学、建筑学、造船航海以及纺织等领域。近些年，生态学的研究也开始兴盛。纵观科技史研究，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关于某一科技问题的历史情况，大多数仅限于科学技术史的范围，很少有联系思想观念来研究问题的。

譬如，关于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目前已经有很多种专著问世，如陈遵妫的《中国天文学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技史所的《中国天文学史》、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郑文光的《中国天文学源流》，还有《中国恒星观测史》等。这些著作集中于天文学的发展史，关心什么时间发明了什么天文仪器，什么时间编制了什么历法，基本上不思考天文学的功用、性质，更不去思考天文学同思想观念的关系。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善，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开始强调所谓“外史”的研究，其本质就是把天文学研究同社会文化史联系起来，思考天文学的政治功用等问题。实际上，这是在强调交叉研究，不再把天文学研究限

制在天文学史内部。

当然，关于把思想史、科技史、社会史等交叉融合起来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专著也存在，但并没有形成气候。目前来看，有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李志超的《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王玉德等的《中国五千年生态文化史论》、江晓原的以《天学真原》为代表的相关天文学研究著作、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冯时的《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等。随着新世纪的开始，这种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风气越来越浓。

二

本书以先秦秦汉文献为基础，采用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以思想史、科技史、社会史、政治史等交叉融合的视角，遵循从自然到人类社会文化的逻辑路径，以专题的形式梳理先秦秦汉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问题。

本书的研究将遵循如下的方法：其一，古文献研究。要理清先秦秦汉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必须以这一时期的文献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合理、可信的结论。此研究是一种尽可能接近历史原貌的分析研究，必须要对相关文献资料全面占有并进行充分分析。本书涉及的文献主要是传世的先秦秦汉文献，也涉及甲骨卜辞以及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

其二，多视角的交叉融合。人与自然关系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思想史、科技史方面的内容，又有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单一的思考不可能反映复杂的现实情况，多视角的交叉思考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有意义的方法。

其三，述与论、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论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描述、分析、归纳，从而得出某一问题的总特征，然后分析论述这些特征的内在原因及其存在的意义。行文力求宏观考索同具体例证的微观分析相结合。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宏观和微观的问题，戴逸先生说：“20世纪历史学研究方法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用宏观的方法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史学家擅长于微观研究，大多考证一件史实、一种古书，从各方面搜集丰富确凿的材料，无征不信。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二者各有长处，分别产生出一批代表著作，都对20世纪史学作出了贡献。我觉得宏观研究应该以微观研究为基础，否则必然会流为空洞无益的议论，所揭示出的‘历史规律’也未必正确。真正的客观历史规律，必须从具体研究成果中概括出来，这种规律才是科学的。同时，微观研究要以宏观研究为指导，为最终目的与归宿。历史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但完全忽视理论的指导也是错误的。”^① 我们赞同戴先生的观点，在先秦秦汉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中也遵循其倡导的方法。

其四，从自然到人类社会文化的逻辑路径。美籍华人哲学家田辰山先生认为“通变”是中国人的思维特征，这种思维特征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在这样的思维特征中，人类社会和自然是偶对互系的，两者处于通变过程中^②。人类是自然的延伸。

^① 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载李济：《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② 田辰山先生认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通变来解释。他谈到，人不仅要通晓事物的变化，即通晓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变化规律，同时也要通变，即按照事物的情势行事。这契合了本论著标题的意义，所谓“顺天而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要知晓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要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律行事。关于田辰山的“通变”理论请参看其著作《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